

## 生病改變了我生命的優先次序 -- 韓雯

2001年10月，我照常打電話回台灣問候父母親，連續兩次爸爸告訴我媽媽去逛街了。對於外向的母親，出門逛街、跳舞、運動都是常事，我也不以為意。第三次媽媽接了電話，我說：「啊！妳終於沒有去逛街啦！」媽媽說：「逛什麼街？」我說：「前兩次我打電話回家，爸爸都說妳去逛街了。」媽媽說：「我得了乳癌，在開刀住院呢！」我強忍著奪眶欲出的眼淚，問她怎麼回事，媽媽慢慢告訴我，她的子宮下垂很長一段時間了，最近特別不舒服。看了一位年輕的女婦產科醫師，建議她服用女性荷爾蒙；才服了兩個月，就發現胸部有紅紅的硬塊。在開刀切片檢查時，確定是乳癌，醫生立刻走出手術房請爸爸簽字切除整個左邊乳房。一切發生得很快，媽媽事後還曾懷疑醫生是否為她做了不必要的手術。當晚我一夜難眠，恨不得立刻飛回台灣看望母親。第二天早上開車上班的路上，突然發現後面一輛警車在閃燈跟著我，我靠邊停下後，警察問我：「妳知不知道妳剛才做錯了什麼？」我搖搖頭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。」警察說：「妳剛才闖了紅燈。」我立刻潸然淚下，對警察說：「很抱歉！我昨晚得知母親得了癌症，正在想要去旅行社買機票回去看她。」眼淚仍不聽使喚的流。警察可能已查出我的記錄，沒有一張罰單與事故，便對我說：「以後開車要小心，闖紅燈是很危險的。」沒有開罰單就讓我走了。

回台灣看到媽媽精神蠻好，恢復得很不錯。雖然她對我敘述了整個過程，身上如何有一根管子跑出來，接到一個小塑膠壺，但我仍然很難想像。接下來陪她回醫院複診兩次，有一個星期日還碰上國泰醫院主辦一年一度的乳癌病友關懷講座。媽媽的主治醫師講述乳癌的病理，營養師介紹如何吃得健康，護理人員講解治療期與術後的照料，增加了不少對乳癌的瞭解。在我回美國之前，媽媽特地叮嚀我回去要做乳房攝影，因為她聽朋友說，乳癌有時會遺傳給女兒的。

我自從在麻薩諸塞州念完書，與先生一起來休士頓，前十年多半從事建築設計與施工的工作。這之間經歷三次流產，終於生了一個兒子，從此他成了我的“最愛”，與我的生活重心。爲了能自由安排時間，儘量參與他的學校生活，我改做房地產經紀。一九九七年，在許多因緣際會下，又重新開始我的保險生涯。頭兩三年公司會緊迫追蹤我們的工作成效，雖然我熱愛這份工作，順利通過各項測試，拿到該有的執

照，工作越來越上軌道，但是隨著工作量的增加，一種無形的壓力也越築越高，連做健康檢查的時間都很難抽出來。

2002年1月，我終於看了家庭醫師，並要求她為我安排乳房攝影檢查。一個星期後，伊莉莎白楊醫師親自打電話給我，說乳房攝影上有一點可疑處，需要再做乳房超音波檢查。拖了一個月，好不容易擠出時間來安排檢查，又接到楊醫師的電話，要我去做切片檢查。我隱約覺得該去安德森醫院檢查；打電話去，對方問我要做“哪一種”切片檢查？她念了幾種方法，我一絲概念都沒有，只好約了我的婦產科醫師去請教，理出一個頭緒後，正式做開刀切片已經是五月了。手術前我的開刀醫師荷理還捏捏我的腳，輕鬆地說：「大概把這個小硬塊拿出來就從此不用再擔心它了吧！」我也輕鬆地想：「希望他是對的」；媽媽不是七十六歲才得乳癌嗎？一個星期後，荷理醫師的護士打電話給我，要我立刻去見醫師，還要我先生一起去；我心想，檢查結果應該是癌吧！但是克成的父親病重，住在醫院裡，他已買好飛機票第二天一早要飛回台灣；今天公司也有好多事要交待。我問護士可否我自己一人來？她說不行，我們一定要妳先生一起來。打電話給克成，他說：「妳放心！我可以來，只要告訴我時間地點」。於是我們一起聽了宣判：「是癌症」荷理醫師要我立刻安排做切除手術，我對他說：「很抱歉！我的婦產科醫師建議我，如果是癌症，最好到安德森癌症醫院去治療。」

或許是因為經歷了母親得癌症的驚恐，由國泰醫院乳癌講座吸收的知識，再加上我一向的自主獨立，對自己的病症反而出奇的鎮定。克成在台灣陪伴父親整整一個月，我在這一個月中仍然如常地在工作、兒子、治病之間穿梭，找時間安排一切。克成由台灣回來那天，人仍在飛機上時，他的父親過世了，任憑我如何勸說要他再飛回去參加父親的葬禮，我有好朋友安娜在安德森醫院上班，會照顧我，他仍然堅持留下來陪我開刀。

手術很順利的完成，我也經歷了媽媽形容給我聽的一切。第一次切片手術後，化驗結果發現我的癌細胞是會蔓延型的，但是這次切除手術報告，竟然未再發現癌細胞，腫瘤也只有零點九公分大。我的開刀醫師(SINGLETARY)將我轉到腫瘤病理科的醫生(THERIALT 德理歐)，他告訴我，我的病症預斷很不錯，不需要化療與放射線治療，只要吃一種荷爾蒙抑制劑加上以後定期追蹤檢查就可以。以後在一次返台陪母親定期檢查時，問她的醫生，發現媽媽得的也是會蔓延型的

乳癌，腫瘤大小與期別均與我很類似，也消除了她當年的疑慮——到底她的醫生是否做了不必要的手術。

我從小瘦弱多病，出生時雖然不是早產，體重只有四磅；兩歲時得了胃出血，幾乎喪命。長大後因著自己任性的個性，認為可以“以毒攻毒”，越濫用身體會變得越健康，在讀書與從事建築工作時，用了比常人加倍的體力與時間，幾次轉行換工作，都拼命不顧一切的要做好。照顧家庭也不遺餘力，唯一沒照顧的是自己。記得公司裡那位希臘後裔的喬治常常提醒我：「雯！我們的人生應該是上帝第一，家庭第二，工作第三，妳怎麼好像全倒過來了？」

癌症就像一記當頭棒敲醒了我。當開刀前，護士為我準備插好點滴的針管，麻醉師來注入麻藥前的一刻，我終於醒悟到，人生、工作、家庭，這一切都不在我的掌管之下，這一針打下去我還能做什麼呢？出院後，幾位信基督教的朋友來看我，為我做吃的，也為我傳講福音。我深深體會到一種溫馨、被愛的感覺，於是告訴克成，等我病好後，要開始去教會，學習接近神。兩年後的感恩節，我受洗成為基督徒。這中間不是沒有掙扎，掙扎的是“如何放下自己”。過去我堅信什麼事都該盡量靠自己，少求人，這是從我祖父與父親傳下來的家教。這場病後，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學會了“放下自己”。以前覺得非要我親自做的事，現在覺得交給別人做也可以；以前像上緊了發條，不停地忙碌，現在也懂得忙裡偷閒，享受一下人生，對自己好一點。以前與先生的關係很緊張，病後也願意接受他的幫助，為我開車，幫我做家事，陪我上教堂，而拉近了我們的距離。

有一次參加貝勒醫院珍妮陳醫師的演講，讓我驚艷於鄧福真的學識。看到她自己走出乳癌的陰霾，熱心致力於幫助新患病的癌友，積極建立中文的資料網，便決心助她一臂之力。其實在籌劃舉辦各式演講、座談會時，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太多了。由一位位活得精彩的癌友身上見證到他們的勇氣與信心，對我也是很大的鼓舞。

這六年多來，我時而活在復發的恐懼中，時而忘記自己的承諾，又埋首在工作中。有幾回在我疑心復發，虛驚一場之後，德理歐醫師的護士建議我去看心理醫師。一位高高胖胖的女醫師問我：「如果我現在告訴妳，妳只有兩個月可活，妳會怎麼活？」我很快地回答她：「我還會繼續工作，也許多抽一點時間出來給我所愛的人寫信別。」她說：「那妳就把每一天當成是妳的最後兩個月，做妳想做的事，而

不要擔心復發的事」；我覺得很有道理。她問我還要不要安排下一個療程，我說：「我想不需要了吧！」

有生就會有死。曾經罹患癌症的人，只是比較有更接近死亡的經驗。如何面對我們自己與我們所愛的人的死亡，是一門藝術，也是一堂很重要的課。讓我們思考到在死亡來臨之前，我們應該如何規劃，如何活得有意義，如何把生命的優先次序排好，才不致於在死亡來臨的時候，感到害怕或遺憾。

一位中國時報的優秀記者冉亮在生命走到盡頭時，引用聖經上說：「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……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，使生命多加一刻呢？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」

